

一九八八：成都会议

——全国高校经济专业深化改革讨论会追记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史晋川^{*}

2008 年,由邓正来教授和郝雨凡教授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出版了,书中收录了由我和朱柏铭教授合作撰写的《研究型大学经济学科办学理念的转变》一文。这篇论文中的表 1 反映了原杭州大学经济学系在 1981-1990 年期间,经济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与课时的显著变化。

表 1 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比重变化

教学计划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占总学时的比例(%)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	占总学时的比例(%)
1981 级	政治经济学(192)、资本论(184)、经典著作选读(68)、政治经济学史(102)、《剩余价值理论》选读(51)	22.7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51)	1.9
1990 级	政治经济学(195)、资本论(14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36)	12.1	微观经济学(76)、宏观经济学(72)、经济学说史(95)、当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流派(57)	9.6

说明:①括号内的数字是课时数。②1981 级教学计划学时总数为 2621,1990 级教学计划学时总数为 3136。

为何在短短的 10 年里,一所国内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学计划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现改名国家教育部)1988 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经济专业深化改革讨论会。(以下简称“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 1988 年 12 月 2 日在四川大学召开,由国家教委高教一司主办,高教一司财经政法处具体负责会议工作,四川大学承担会务工作。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国家教委直属的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当时极少有大学设经济学院),加上少数几所非国家教委直属的省部属综合性大学经济学系和财经院校的负责人。在作者的会议记录中,后来在大会上发言的就有北京大学余学本教授,复旦大学伍柏麟教授,南开大学高峰教授,西南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等。当时,我是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同时主管系里的本科生教学工作,所以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 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电子邮箱:shijinchuan01@163.com。本文根据作者当年工作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整理撰写。经《经济观察报》编辑部授权,本文主要内容转载自作者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1988:成都会议”与教育改革》一文,其它内容根据作者原文补充。

会议开幕式后,首先由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夏司长作大会报告。夏司长指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国家教委召开的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会议,会议的重要背景是1989年2月国务院准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要专门讨论教育问题。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教育问题工作小组,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5大问题,即:教育立法、教育规划、思想政治工作、办学体制和教学改革。因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改革,通过会议要明确改革方向,制定教改方案;会议的具体任务是讨论国家教委关于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意见(修改稿),制定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计划。

全国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研讨会 88.12.2.

一、教委高教一司夏司长讲话。

1. 情况作。① 总点调研② 小型调研会。88.5.
③ 起草深化改革意见(88.6-7) 在长春 王东树组织起草。
④ 修改意见稿。11月中旬南开 即说会议文件。
建国以来第一次高校经济学专业改革会议

2. 经济学专业改革与经营、财政委训整训会议。
明确改革方向、制定具体方案。

3. 会议 ① 讨论意见稿。② 讨论修改后的教学计划

夏司长在谈到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的紧迫性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高校教学方面的弊端,风趣地把当时的教学弊端主要表现概括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蒋”(僵)—教学思想僵化,“宋”(松)—教学体系松散,“孔”(空)—教学内容空泛,陈—教学课本陈旧。与会者闻言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成都会议”的与会者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直抒己见,对经济学专业的性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重要的教学计划制定问题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共识。但在我看来,成都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高校经济学专业基础课设置及相应的教学计划。这份教学计划最核心内容是提出了16门课程为经济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并规定了每门课程的总学时/周学时和相应的学分:

- 1、政治经济学 2 学期,周学时 6,4,学分 10;
- 2、西方经济学(含微观、宏观) 2 学期,周学时 4,4,学分 8;
- 3、统计学 1 学期,周学时 3,学分 3;
- 4、会计学(同 3);
- 5、货币银行学(同 3);
- 6、财政学(同 3);
- 7、国际金融(同 3);
- 8、国际贸易(同 3);
- 9、发展经济学(同 3);

10、高等数学 3 学期,周学时 6、6、4,学分 16;

11、经济法(同 3);

12、计量经济学(同 3);

13、经济学说史 1 学期,周学时 4,学分 4;

14、近现代中国经济史(同 13);

15、世界经济(同 3);

16、计算机应用(同 13)

会议的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对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取向表示赞同,认为新的教学计划突破了传统教学体系的框架,并对新的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设置予以充分肯定。

刘诗白教授在发言中批评说,原有的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和教学只是孤立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斥了西方经济学;

伍伯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包括西方经济学,现在必须以更宽广的眼光认识经济学理论;

洪银兴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要重视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要有重新认识……等等。

作者本人当时只是一名资历尚浅的年轻副教授,没有资格被小组推荐上台去作大会发言,但在小组讨论中也很兴奋,踊跃发言,表达了完全赞同把西方经济学设置为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意见。我积极赞同新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的原因之一是:自己 80 年代初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所学的专业就是西方经济学,但当时这个专业名称是“经济思想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

毋庸回避,“成都会议”的与会者对经济学专业的改革,尤其是对教学计划及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也存在许多意见分歧。最主要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资本论》在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地位;二是西方经济学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及课时数量。

与会者对于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必须坚持继续开设《资本论》课程,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突出的意见分歧在于:《资本论》应该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第一小组在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看,《资本论》也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教学中不能忽视;从国内的现实出发,《资本论》也必须列入必修课程,以《资本论》选读的课程名称保留下来,但同时课时要有较大压缩,教学方式也应加以改进。这一意见为当时大多数与会者接受。南开大学的高峰教授思想比较解放,独树一帜,大胆提出设置《经济学名著选读》(其中包括《资本论》),用来替代《资本论》选读课程,列为选修课,开设一学期,每周 4 节课,计 4 学分。

与会者对于在教学计划中规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要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同样基本上也不存在分歧。突出的意见分歧在于,部分与会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具有相同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从而提出了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双基础理论”命题;而另一部分与会者不同意或反对“双基础理论”的提法,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指导地位,在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来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内容,批评西方经济学中的思想糟粕。持后一种意见的学者同样也认为,在新的教学计划中,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和学分也应该再减少一些,以不超过 6 学分为宜。有趣的是,主张缩减西方经济学课程学时和学分的学者,主要矛头永远对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极少将矛头指向计量经济学。可能是在他

们看来,计量经济学较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有用处。

“成都会议”的闭幕式上,夏司长在总结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对《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及教学问题的看法,他强调指出(以下是我当时会议记录的原文):

“资本论选读拟作为必修课,但课时必须大量压缩,教学方式必须改进;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学一些节选,训练学生逻辑思维。”

“西方经济学需加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但以不提‘双基础’提法为好。”

“成都会议”结束后,国家教委邀请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的专家,对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及基础课程设置进行了多次论证,对“成都会议”提出的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及基础课程设置也做了许多修改、补充和完善。随后,国家教委在1990年确立并发文颁布了高校财经类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1门核心课程,即:经济数学基础、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发展经济学。此后,1999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进一步修订了经济学专业教学计划,并规定了高校经济学类各专业的8门核心课程,即: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

回顾历史,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实际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一部分高校经济学系陆续自行做起来了(我记得原杭州大学在1984年就邀请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海闻,来经济学系给学生开设数量经济学课程,用的教材是邹至庄教授的著作《中国经济》);但从顶层设计的视角来看,大致上可以说是在1988-1999年这11年中全面推开的。当然,这项教学改革当年只是在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层面展开,从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层面看,这项教学改革至今仍在不懈的探索中。

“一九八八:成都会议”拉开了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序幕!